

以赋作存佚差异证《诗赋略》之品第高低分类说

余玲芳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225

摘要: 既往研究多聚焦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文本考辨及赋家赋作内容之维度。笔者则从文献传播的路径,通过考察赋家赋作数量和存佚数量的关系,揭示赋作存佚与创作者身份、赋作传布收藏的深层关联,发现可见汉代官方藏书偏好,既影响了班固对赋体分类的标准,也影响了后续赋作的流传。本文主要从赋家身份与赋作存佚情况考、汉代藏书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分类思想、汉代赋作的传播考察等几方面进行阐述,以期对赋分类之“品第优劣”说提供论据。

关键词: 诗赋略; 文献传播; 赋作存佚; 品第高低

汉代班固根据西汉刘向《七略》撰《汉书》,其中《诗赋略》著“大序”一篇,将赋分为四类,第四类统称为“杂赋”,其余三类,分别以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为首,四类赋后无“小序”进行解释说明。故《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之分类问题,历经汉魏六朝以迄当代,一直是聚讼纷纭的重要命题。其中代表性观点有:一是以“别集”“总集”相区别,如章学诚,认为前三类以作家个体为纲的著录方式实开后世别集之先河,而杂赋以题材汇编的体例则可视作总集之雏形;二是以内容风格为分类标准,如章太炎提出“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三是以文学体例为分类标准,如姚振宗提出此四类分别属于“皆楚骚之体”、“大抵不尽为骚体”、“大抵皆赋之纤小者”和“大抵尤其纤小者”;四是以品第高低为分类标准,如章必功指出屈原赋一类为最上,陆贾赋一类与孙卿赋一类相继次之。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类,著录赋家六十六人凡七百七十一篇,而今可考者不足十分之一。而其中中央文史赋作存留率高于诸侯藩国文士,这或与汉代朝廷藏书有关,符合主流价值观,受官方认可的文章,被官方重点保存收藏。此种赋作存佚的差异,恰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赋家的次第排序形成对照,从而为赋分类之“品第优劣”说提供论据。可见汉代官方藏书的这种偏好,既影响了班固对赋体分类的标准,也影

响了后续赋作的流传。

本文主要从赋家身份与赋作存佚情况考、汉代藏书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分类思想、汉代赋作的传播考察等几方面进行阐述,以期对赋分类之“品第优劣”说提供论据。

一、赋家身份与赋作存佚情况考

第一类赋以屈原赋为首,为战国末期楚国贵族,其赋作二十五篇,暂不论某些篇目的所属问题,屈原赋现存二十三篇,占原赋作十分之九;唐勒,楚王宫廷文学侍从,善辞赋,其赋作四篇早已失传,郦道元《水经注·汝水》曾引唐勒《奏土论》“我是楚也,世霸南土”,《奏土论》并不在赋作四篇之列,1972年4月,山东银雀山西汉初年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未见著录的唐勒赋残篇;宋玉,亦为楚国士大夫,赋作十六篇,现存相传是宋玉的赋共有十三篇,占原赋作五分之四;赵幽王刘友,为汉高祖刘邦第六子,曾被立为淮阳王和赵王,其赋作一篇,今不存;庄夫子下注:名忌,吴人,是梁孝王刘武门下有名的辞赋家,其赋作二十四篇,今仅存《哀时命》,占原赋作二十四分之一,《哀时命》也属于骚体,内容亦是苦叹屈原身世;贾谊,其平生经历与屈原有相似之处,其赋作七篇,现存五篇,分别是《惜誓》、《鹏鸟赋》、《吊屈原赋》、《旱云赋》和《虞赋》,占原赋作七分之五;枚乘,先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后游于梁国,为梁孝王刘武的文学侍从,赋作九篇,今存三篇,分别为《七发》、《梁王菟园赋》及《忘忧馆柳赋》;司马相如,为西汉时期的辞赋家,先后伴于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身边,赋作二十九篇,今存五篇,占原赋作约六

作者简介: 余玲芳(1997.06-),女,四川遂宁人,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汉代文献。

分之一；淮南王刘安，为汉初汉赋爱好者和践行者，有赋作八十二篇，今仅存《屏风赋》一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此为一笼统数字，未知作者和篇目名，无法得知其存佚情况；太常蓼侯孔臧，为孔子第十代孙，其赋作二十篇，现皆已不存；阳丘侯刘堰，其继父为淮南王刘安，赋作十九篇，今不存；吾丘寿王，赵人，曾任侍中中郎、光禄大夫侍中，以善作赋而有名，赋作十五篇，今不存；蔡甲，赋一篇，今不存；上，下有颜师古注：武帝也。其作赋二篇，今存《悼李夫人赋》一篇，占原作二分之一；倪宽，千乘人，因精通经学而受武帝赏识，其赋作两篇，今不存；光禄大夫张子侨，与王褒、刘向同时人，其赋作三篇，今不存；阳成侯刘德，刘向之父，有智谋，习黄老之术，其赋作九篇，今不存；刘向，其赋作三十三篇，仅存《九叹》一篇；王褒，西汉时期辞赋家，常从宣帝游猎，后任谏议大夫，侍奉太子读书，其赋作十六篇，今已不存。共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存五十三篇，今占百分之十四。

第二类以陆贾赋为首，陆贾，西汉楚国人，早年跟随刘邦打江山，有辩士之称，其赋作三篇，今仅有存目《孟春赋》；枚皋，为枚乘庶子，曾为汉武帝文学侍从，其赋作百二十篇，仅有四存目《平乐馆赋》、《皇太子生赋》、《立皇子谋祝》、《奏卫皇后戒终赋》；朱建，善辩，与陆贾相熟，赋作二篇，今无存；常侍郎庄忽奇，与枚皋同时人，赋作十一篇，今无存；严助，为庄忌之子，武帝时为中大夫，其赋作三十五篇，今仅有二存目，分别为《相儿经》和《严助赋》；朱买臣，经严助推荐后被拜为中大夫，赋作三篇，今无存；司马迁，曾为郎中，陪汉武帝出巡，赋作八篇，现仅存《悲士不遇赋》片段；婴齐、臣悦、臣吾和辽东太守苏季暂未考；萧望之，名儒也，曾教授太子，汉宣帝、汉元帝时任官，其赋作四篇，今无存；徐明，下有注：元、成世历五郡太守，其人政绩突出，然其赋作三篇，今已无存；李息，为皇帝近侍之臣，其赋作九篇，今无存；淮阳宪王刘钦，汉宣帝之子，其赋作二篇，今无存；扬雄，汉代著名赋家，刘歆在著录《七略》时，记扬雄赋作四篇，班固后增改为扬雄赋十二篇，今存十一篇；冯商，与扬雄时代相近，其赋作九篇，今无存；杜参，为博士弟子，曾与刘向同校书，其赋作二篇，今无存；张丰，张子侨之子，为车郎，其赋作三篇，今无存；朱宇，为骠骑将军，其赋作三篇，今无存。共赋二十家，二百七十四篇，存二十篇（包括存目），今占百分之七。

第三类以孙卿赋为首，孙卿，荀子，曾三次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其赋作十篇，今存五篇，占二分之一，分别为《礼》、《知》、《云》、《蚕》、《箴》五篇；秦时杂赋九篇，未有著人和篇目，暂不可考；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名、文皆不可考；广川惠王刘越，孝景帝之子，其赋作五篇，今无存；长沙王群臣赋三篇，未有著人和篇目，暂不可考；魏内史赋二篇，仅有官职与姓，名、文皆不可考；东曦令延年赋七篇，今无存；卫士令李忠赋二篇，今无存；张偃、贾充、张仁、秦充，其名、文皆不可考；其后诸人都无赋作留存。以孙卿赋为首的这类赋家共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存五篇，今占百分之三。

通过以上对《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前三类所列赋家身份和赋家赋作存佚情况的梳理，可以得到以下信息：首先，在三类赋作家大概一致的情况下，第一类的赋作家创作数量最多，且赋作现存数量最多；其次，从赋家身份的整体来看，第一类的赋作家，与皇帝的距离更近，大多做过皇帝的侍从，史书都有留存其资料，第三类的赋作家，除了孙卿外，其余人的官职较小，且都是一些不太为古籍载姓，亦不为今人知；此外，从赋作创作内容来看，第一类的赋作中有不少为骚体赋，第二类的赋作者中，有辩士陆贾、朱建，有儒士萧望之，有经学博士杜参，第三类的赋作家的作品大都没有列存，可能与赋作家身份不高以及赋作质量不高有关。最后，将第一类的赋作存留率和二、三类对比，可以发现中央文吏赋作存留率高于诸侯藩国文士，这或与汉代朝廷藏书有关，符合主流价值观，受官方认可的文章，被官方重点保存收藏。由此可窥《诗赋略》在著录赋家赋作时，受汉代藏书情况的影响是秉持着“以人系文”的思想，而作家的次第排序，又考虑了赋作的内容与风格。

二、汉代藏书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分类思想

班固《汉书·艺文志》是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编写。而刘歆是参考其父刘向整理国家藏书的结果《别录》撰写的《七略》。所以虽然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时候，是受了汉代藏书情况的影响，但是反过来，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内容，可以反推汉代藏书思想。

《汉书·艺文志》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又进一步细分为38种。“六艺”也就是指儒家的“六经”，包括《易》、《书》、《诗》、《礼》、

《乐》、《春秋》。刘歆在分类时不仅以“六艺”为首，而且“六艺”类所包含的书籍占《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籍数量的很大比重。如此以“六艺”为纲，体现了西汉独尊儒术、重视经学的社会氛围。“诸子略”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十家。“诸子略”依然是以儒家为首，道家次之。而“诗赋略”就比较特殊，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等五类。在“诗赋略”中并未完全贯彻独尊儒术的思想，如在第一类“屈原赋之属”第十一个人孔臧，为孔子第十世孙，既未列于首位，他的赋作二十篇也没有存作了，不算被重视保存的对象。此外，第二类“陆贾赋之属”倒数第三人杜参为博士弟子，而排在他前面的人的身份有文学侍从。但是这两个人也并未被列在第三类最末，而且列在最首的屈原思想与儒家所提倡的思想内容非但没有完全重合，甚至有相冲突的地方。这就说明在“诗赋略”中“独尊儒术”的思想与其他分类思想发生了综合。

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第一类的赋作者身份来看，屈原、唐勒、宋玉都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其后的赵幽王、庄忌、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淮南王刘安等都是帝王身份的近臣或王侯，第三类的赋作家，除了孙卿外，其余人的官职较小。这样排序次第或是根据汉代官府藏书的标准进行的，而这种分类排序标准对人物的重视性不一，其原因有二，一是受汉代社会的楚国文化浓厚、二是依据赋作者身份的高低性，而且其中相近人物的顺序以时间先后为考量，如宋玉赋下注“与唐勒并时”，张子侨下注“与王褒同时也”。此外，第一类“屈原赋之属”多言情讽喻之物，较重视言之有物；第二类“陆贾赋之属”以陆贾、朱建两辩士和擅作诙谐小赋的枚皋列于前，由此可窥《诗赋略》在著录赋家赋作时，受汉代藏书情况的影响是秉持着“以人系文”的思想，而作家的次第排序，又考虑了赋作的内容与风格。

三、汉代赋作的传播考察

实际上，《诗赋略》无论是以章学诚所言以“别集”“总集”相区别，还是如章太炎所提出的以内容风格为分类标准，还是以姚振宗所说的以文学体例为分类标

准，还是以章必功所言的以品第高低为分类标准，其展示的只是迄至东汉，整个汉代的部分藏书情况。因为受官方控制的石渠阁、天禄阁等地会认真保存受国家认可、重视作家的赋，而反之不受国家认可、重视作家的赋，会因没有受到完好保存，而亡佚。这就导致人们所能看到的汉赋，基本上是当时官方认可的好文章。

另一方面，汉代官方对不同人的作品重视程度和汉代官修书籍，如官修目录，也会影响到汉代士人对收藏书籍的选择。可能存在官方不重视，则民间士人也不会去收藏、誊抄、售卖此类书籍。久而久之，这些不被认可和重视的书籍就会逐渐散佚。这也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三类赋作存佚情况差异大的原因。

总结

所以，通过上文从赋家身份与赋作存佚情况考、汉代藏书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分类思想、汉代赋作的传播考察等三方面进行阐述，可以看出汉代官方的收藏偏好，既影响了哪些赋能传到今天，同时也影响了刘向、刘歆和班固等人给“诗赋略”分类时所贯彻的标准，也就是由此足证赋分类之“品第优劣”说。

参考文献

- [1]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G]//二十五史补编.上海:开明书店,1936.
- [3]酈道元.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20.
- [4]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5]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6]章必功.说《汉志·赋略》四种[M]//汤一介.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 [7]谭家健.《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J].文学遗产,1999(05).
- [8]曹明纲.宋玉赋真伪辨[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02).